

# 容闳的爱国思想及其留学教育实践活动

陈 国 贵

近代社会,容闳是第一位留学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学者,亦是中国首批官费留学外国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为我国培养了具有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的第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他的爱国思想和留学教育活动曾受到中外人士的重视和赞扬。1912年4月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亲自寄去照片,表示对他的信赖和尊重。

## 一

1828年11月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南屏镇。在封建专制的社会,容闳因家道贫寒,还在同龄儿童欢乐的时代,就不得不为减轻家庭生活的负担而参加劳动。他做过小贩,走乡串巷卖糖果;干过农活,在水深及脰的稻田中,芸草、割稻;当过学徒,在外国人办的印刷厂折叠书页。容闳年纪稍长,为了学点知识,将来能找到工作维持生活,被迫离开父母和家乡,远涉重洋到美国学习。容闳在美国是一个苦读学生。他先后在孟松预备学校、耶鲁大学肄业。为了减少开支,容闳洒扫拂拭、劈柴生火等劳动都干,“雪深三尺,亦必徒步”学习。为了挣钱生活,容闳不断“为人工作”,替同学办伙食,替“兄弟会”管理图书。

1847年至1854年,容闳先在孟松预备学校“仅治拉丁文十五月 希拉文十二月,算术十阅月”<sup>[1]</sup>后,即装束东行赴纽海文迺趋投考,考上了美国第一流的耶鲁大学。容闳学习刻苦用功,“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在耶鲁学习时,“英文论说颇优,第二第三两学期连获首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sup>[2]</sup>。反映美国人民对这位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成绩表示钦佩。容闳在美国学习了拉丁、希腊文和数学、“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等课程,吸受了西方的科学知识,亦受到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熏陶,但他并不因此而忘了祖国。在学习期间,容闳念念不忘中国,十分关心中国的前途,他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中国国民,身负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sup>[3]</sup>。

容闳在入耶鲁大学之前,因生活困难曾向孟松预备学校申请资助,校方回答是“愿受其资助者,须先具志愿书,毕业后愿充教士以传道,乃克享此利益”。容闳得此通知后,“不待思索”,“决然不向该校请求”<sup>[4]</sup>,断然拒绝毕业后充当传教士工作。在容闳看来,要他当传教士,且不是束缚了他日后决心为中国谋福利的手脚,用容闳的话说就是“予之对于此等条件,则不轻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因此“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肯”<sup>[5]</sup>。

1854年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这是一个亟待考虑和决断的问题。如果留在美国,容闳有许多好条件。他留美已有七年之久,对美国比较熟悉,生活早已习惯;他交游广,在美国认识的朋友多,找到好的工作是不成问题的。正如美国

人特韦契耳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所说：“容闳毕业时受到了莫大的劝诱，让他改变终生的打算。他留居美国已久，具备彻底归化的资格。事实上，他已经是美国公民。他理智上、道义上的一切兴趣、情感和爱好，使他在美国如在故乡。而且，由于他的毕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机会向他开放了：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sup>[6]</sup>。相反，如果回到中国，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有谁知道他聘请他，让他将所学到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传播于中国呢。他要在中国找到工作，施展抱负，实在困难重重。特韦契耳就曾说过：“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立足之地。不仅如此，而且考虑到他在哪里呆过，成了什么人，想要干什么，他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此较之下，容闳“非常想留在美国”<sup>[7]</sup>。

事实上，早在容闳留学美国之前，即1818年（清嘉庆二十三年）就有来自中国广州的一名王姓学生进入美国康州康威尔城的“外国布道学校”学习。至于到欧洲教会学校学习的中国人就更早了，可以远溯到郑玛诺，他“自幼往西国罗马，习格物穷理超性之学，并西国语言文字……康熙十年来京，十三年甲寅卒”<sup>[8]</sup>。可惜这些中国人是软骨头，他们向西方学习，不仅名字被西化了，而且还以传教士的身份派往中国，欺骗中国人民。他们完全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容闳与郑玛诺之间毕竟有着天渊之别。容闳虽然喜欢美国，但他不愿因个人的利益而留居美国。他亟待回国工作。以后虽然在国内屡遭冷遇几经迫害，不得不因老病居住美国时，容闳仍念念不忘尽忠报国之情，在逝世之前还留下遗言要他出生在美国的两个儿子回国工作，以偿还他为国服务的殷切心愿。容闳的族侄孙容麟学（联芳）在记叙时说：“公易箴时，犹囑其二子觐彤、觐槐弃所营业回助祖国。二子良不愿，缘当时均有优异之职业，月俸甚厚。公责之曰：‘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材，愿冀回报祖国，今不此之务，惟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非我所望于汝二人者。’二子遂于正义，乃以父命遄归祖国”。

因此，容闳虽然身在美国而心却始终不渝的热爱着中国，那怕中国腐朽黑暗，贫穷落后，民不聊生，他亦不嫌弃它，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着希望。容闳所想的是如何使西学传到中国，让中国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安康。容闳曾说：“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sup>[9]</sup>。当容闳大学毕业拿到羊皮纸做的美国大学文凭后，就立即起程回国了。

## 二

举办留学，是容闳的心愿，还在大学期间，在他胸中就有所规划。容闳要通过培养人才，把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输入中国，使中国由一个腐朽落后的封建帝国改造成为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容闳写道：“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sup>[10]</sup>。为了实现这个教育计划，他不怕艰难困苦，努力为之奋斗。1855年，容闳在美国派驻中国的特别委员、暂代公使派克处任书记，“意本不在金钱，欲借派克力识中国达官，庶几得行予志。颇派克虽摄公使，乃非近水楼台，知予之计划甚左。三月后遽自行辞职”<sup>[11]</sup>。1856年，容闳至上海，在海关翻译处工作，月薪优厚事亦不繁，阅三个月，发现海关有一恶习。中国商人与海关中通事，互通声气，狼狈为奸，以

图中饱。容闳知道后,认为处此浊流不可能实现教育计划,深恶其卑鄙,不屑为伍,辞去工作。回国不及一年,虽几易工作教育计划还无实现的机会时,容闳仍不灰心,并决心干下去。容闳回忆这时的思想时说:“归国以来,未及一年,已三迁其业。若长此见异思迁,则所希望之事业,或且如幻灯泡影,终无所成。又非不自觉予之希望过奢,志向过高,颇难见诸实行”,“予之生于斯世,既非为哺啜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于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计,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予于所事,屢次中辍,岂好为变迁哉”<sup>[12]</sup>。以后容闳又在英商某公司工作,想“借此以多识商学界上流人物,推广交游,以遂予之第一目的”<sup>[13]</sup>,结果又告失败。

1860年冬,容闳到达南京,把办教育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容闳说:“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借手,可以为中国福也”<sup>[14]</sup>。在会见干王洪仁玕时即进呈振兴太平天国的七条建议,并声言“倘不以为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sup>[15]</sup>。洪仁玕曾在香港工作,对欧美各大强国所以富强的原因,早已知其秘钥所在,对于容闳的七条建议“极知其关系重要”,可惜的是,天王洪秀金深居简出,无意此事,其他诸王又忙于战争,无暇顾及,天国除了给容闳一个“义”字四等爵衔外,无任何实施七条建议的表示。此时,容闳已深深感到“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sup>[16]</sup>。不图此行结果,又毫无所得。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开始掀起一股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容闳因在美国购置机器有功,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并专折奏准特授五品候补同知,在江苏省行政署为译员。容闳利用职务之便向江苏巡抚丁日昌陈述教育计划。丁日昌在政界中,要算是识时务,有进取精神,力主洋务的重要人物。他对容闳的教育计划十分重视,要容闳速具详说帖,愿为代奏当朝军机大臣文祥。容闳随即撰为“条陈四则”请丁日昌转送北京。四条曰: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止外力之侵入。以上四条有所侧重,按照容闳的设想是“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条陈之第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sup>[17]</sup>,准备在政府批答准驳时留有余地。后因文祥丁艰,不久病死原籍,上转清政府的条陈落空。容闳没有灰心,以后在每次会见丁日昌时,总是“恳其常向曾督言此,以免日久淡忘”<sup>[18]</sup>。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清政府派曾国藩、丁日昌等前往天津办理交涉,容闳随任翻译。当交涉了结众人尚未散去时,容闳乘机进言于丁日昌,请其向曾国藩再提留学教育一事。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推行者,对于派遣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事、船政、步算、制造诸学,早已“深颺其言”,闻丁所言当即联衔入奏。这年冬,清政府发文着照所请。从1855年至1870年,容闳为之奋斗达十五年之久的留学教育计划,至此才有了实现的希望。容闳自谓从此“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sup>[19]</sup>。容闳在听到这一消息时,简直控制不住内心激动的心情,“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sup>[20]</sup>。

### 三

留学教育计划批准后,容闳到南京向曾国藩面呈一切,拟定四事:“曰派出洋学生之额数;曰设立预备学校;曰筹定此项留学经费;曰酌定出洋留学期限”<sup>[21]</sup>。曾国藩、李鸿

章根据容闳的四事,联合奏呈《挑选幼童及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又奏呈《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六条,对留美目的、招生人数、挑选条件、学习年限、所需经费等均作了具体规定。奏呈中指出,留学美国的目的是“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sup>[22]</sup>。招生人数“照予前次所拟,暂定为百二十人,分四批,每批三十人。”<sup>[23]</sup>挑选条件是“不分满汉子弟,俱以年十二岁至二十岁率”(后定为十二岁以上,十五岁以下)“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士检验,方为合格。考试科目为汉文之写读;其曾入学校已习英文者,则并须试验其英文”<sup>[24]</sup>。学习年限为十五年。其留学经费及出洋服装,皆由政府出资供给,在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同时,还规定未出洋之先,学生家长须签名于志愿书上,书中载明自愿听其子弟出洋留学十五年;十五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概不负责。为办理留学事宜,先后在中国上海和美国哈富两地设立留学事务所机构,清政府任命陈兰彬、容闳等为出国留学学生正副监督。

容闳接任副监督后,担负了培养留学人才的重要工作。当监督几易其人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留学教育。当委任他为驻美国副公使时,由留学生监督调任为全权公使,是为迁擢,事属可喜,不少友人亦为容闳的升迁而往贺。可是对于升迁一事,容闳不以为荣,反以为忧。在容闳看来,公使一职不是他追求的事业,他所追求的是“以教育计划言,是予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容闳认为此时他不能离开留学生监督工作,“今发轫伊始,植基未固,一旦舍之他去,则继予后者,谁复能如予之热心,为学生谋幸福耶”。为培养国家有用人才,容闳决定放弃公使职务,专心监督工作。他婉言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俾得仍为学生监督,以期始终其事。俟将来留学诸生,学成种种专门学术,毕业归来,能为祖国尽力,予乃卸此仔肩。如是量而后入,予个人对于祖国,得略尽其天职”<sup>[25]</sup>。照按容闳的请求,清政府只好任命容闳为副公使兼留学生监督工作。此后,容闳“于留学生方面,仍得有权调度一切”<sup>[26]</sup>,从而保护了留学生的正常学习和活动。这反映了容闳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高尚品质,连美国人都说“容闳期望去接受华盛顿的住所,但不放弃对留学事务所的总监督,因为留学事务所对他是如此地亲切,花费他如此多的心血,其中凝聚着他对祖国最强烈的爱国愿望——因为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sup>[27]</sup>。

1871年在上海招收第一批留美幼童,因当时风气守旧,科举制度盛行,一般人视远洋留学为畏途,“不知外国教育之价值,多踌躇不愿报名”<sup>[28]</sup>;一些达官显贵又都醉心于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的科举“正途”,提到学习外洋科学技术,根本不屑一顾,反对“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sup>[29]</sup>;宣传工作较差,不少人还不知道出国留学一事,“当时中国尚无报纸以传播新闻,北方人民多未知中政府有此教育计划,故预备学校招考时,北人应者极少”<sup>[30]</sup>,学生人数未达第一批定额。为此,容闳亲自到香港,在英国政府所办的华侨子弟学校中,遴选中西文略有根底者以足其数。1872年夏季之末,第一批留美学生三十人,在留学生监督陈兰彬等人带领下乘船横渡太平洋赴美国学习。这是容闳倡导的由清政府正式派遣出国留学的开始。从1872年至1875年,先后四批,共一百二十人,分批赴美国留学,实现了容闳原定的留学教育计划。

为了安排留美学生的学习和食宿等问题,容闳先期赴美。经过努力在美国康纳特克省教育

司拿德鲁布的支持下,“将学生分处于新英国省之各人家,每家二三人,但须相去不远,庶便于监视。俟将来学生程度已能入校直接听课时,乃更为区处”[31]。由于容闳的努力和中国人民的热情接待,中国学生到达美国后,很快就适应了环境并转入正常学习和生活的轨道。1874年,在容闳主持下,于哈特福德之克林街,建造起一座坚固壮丽的三层楼的房屋,解决了中国留学事务所工作人员和学生的办公、听课和食宿问题。

留学生的英语达到能说能听能写的时候,容闳及时把他们送入当地中小学学习,中学毕业时又引导他们考入高一级专业技术学校或知名的大专学校,学习与近代化有关的机械工程、开矿、造船、交通运输、邮电、农业、医学等专业。容闳关心留学生的学习,亦关心他们的思想行为。由于容闳的苦心教育,使留学生得到了健康的成长。对于品学兼优的中国留学生,美国人也倍加赞扬。耶鲁大学校长朴德在写信给清政府时说:

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32]

容闳倡导留学教育的心血没有白花,他造就了掌握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的第一代人才。这些留美学生回国后,“头批学生二十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有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二十三名,其余五十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33],以后经过四年的月课、季课多次考核,“试以所习各艺,均能融会贯通,各有所得”,李鸿章亦承认分赴水师工作的,“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洋师每有不传之秘,该学生等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折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此外,水雷、旱雷施放灵捷,驾驶、测量讲求精细”。分赴各营当教习的,对“外洋操法、阵法、口令均臻娴熟,所教弁勇,颇有成效”。分赴电报工作的,“传递紧要军报,听夕从公,密速无误”。其他分赴步算、制造、医学工作的,“均能深明窍要,质诸西洋教习及泰西各国水师兵官,咸谓该学生等造诣有得,足供任使”[34]。我国近代著名的铁路工程师、爱国者詹天佑,就是1872年首批留美学生之一。詹天佑到美国后,先后进入西海文小学、纽海文中学、耶鲁大学学习,毕业时成绩优异,名列第一,获得学士学位。詹天佑的学习生活,无疑是与容闳的关心爱护分不开的。

#### 四

容闳倡导的留美教育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内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容闳任监督后,与陈兰彬共事,时有抵触,“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著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为反对以阻挠之”[35]。例如对学生在学校或假期中应该报销的正费及各种杂费以及平时参加游戏、体育活动、改易服装等一般琐碎小事,都经常发生矛盾。每次解决这些问题时,陈兰彬与学生常生冲突。对于这些冲突,在容闳看来,学生既至美国留学,日受西方科学文化教育的陶熔,其学识随年龄而俱长,由于终日饱吸自由之空气,对于久处封建专制极重之压力,一但推倒在地,其言论思想都与封建旧教育不侔,喜欢各种健身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这是正常的事,陈兰彬又何必多管闲事深加阻拦。容闳为此常居间为调停人。遇到学生正当的请求,陈兰彬有意不允时,容闳亦主动为学生辩解。久后陈兰彬认为容闳是在偏袒学

生,虽未形诸词色而内心早已不和。当陈兰彬到华盛顿赴公使任后,对留学事务,感情益加恶劣,并推荐“性情怪僻”的吴子登继任留学生监督。陈兰彬所以推荐吴子登,“不啻表示其自居反对党代表地位,揎拳掳袖准备破坏新政,以阻中国前途之进步”[36],可见其用心之险恶,“于是留学界之大敌至矣”[37]。

吴子登属顽固派人物,对于中国学生留学外洋,“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又因前与曾文正、丁日昌二人不睦,故于曾、丁二公所创之事业,尤思破坏,不遗余力”[38]。1876年秋,吴子登任事以后,“即召各生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跪拜礼,监督僚友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39],极为不满。对于从前留学已定之成规,处处吹毛求疵,苛求其短。有不满意之处,又不明说,暗地里制造谣言,通消息于北京,说容闳若何不尽职分,若何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学生在美国专好运动游戏之事,读书少而游戏多;效尤美国人加入各种秘密社会,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皆有不正当的行为;照此下去学生绝无敬师之礼,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过耳;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全部留美学生。吴子登还专程去华盛顿,向陈兰彬密商破坏留学一事。1881年,陈兰彬正式报告清政府:

“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报应将局裁撤”[39]。

对于吴子登、陈兰彬的毁言,容闳知道后,十分气愤,并上书反驳据理力争。书中略谓“凡此捕风捉影之谈,皆挟私恨者,欲造谣生事,以耸听闻。予固知造此言者,其人性情乖张,举止谬妄,往往好为损人不利己之事,似此荒谬之人,而任以重职,实属大误”“吴子登苟非丧心病狂,亦何至欲破坏此有益于国之事?愚以为若吴子登其人者,只宜置之疯人院或废病院中,恶足以任留学生监督”[40],希望李鸿章勿听谗言,支持留学工作。

这时,美国正掀起一股反华浪潮,肆意破坏中国留学工作。美国国会上议院议员,为竞选总统取悦于工党获取太平洋沿岸一带之选票,竟大唱反华论调。当容闳致书美国国务院要求选送学生进入威斯旁特和安娜波利斯海陆军学校学习时,在美国资产阶级反华浪潮的影响下,美国国务院亦复书拒绝,其言曰:此间无地可容中国学生。

在内有顽固派的破坏,外有美国政府拒绝的情况下,李鸿章迫于压力,“此时不愿为学生援手,即顺反对党之意而赞成其议”[41],同意撤回留美学生。1881年下半年,一百二十名留美学生,除因故中途辍学和病故外洋的二十六名外,余下的九十四名,分三批全部归国。至此,容闳倡导的留学教育计划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破坏下而结束了。但是留学教育已开风气“种子既播,终不灭亡”[42]。1877年至1886年,清政府就曾三次派遣学生留学欧美各国。

[1][2][3][4][5][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3][24][25][26][30][31][32][35][36][37][38][40][41]《西学东渐记》21, 21, 22, 19, 19—20, 23, 88, 32, 36, 40, 63, 57, 63, 88, 88, 91, 90, 91, 92, 100, 101, 93, 94, 108, 102, 102, 101, 101, 104, 107页

[6][7][27]《西学东渐记》代跋

[8]韩霖、张庚《圣教信证》

[22]《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见《洋务运动》第二册第153页

[28][42]《华人留学美洲之今昔》见《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十二号

[29]《翁文恭公日记》见《洋务运动》第八册第231页

[33][34]《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见《洋务运动》第二册第167—168页

[39]《留美中国学生小史》见《留美季报》172页